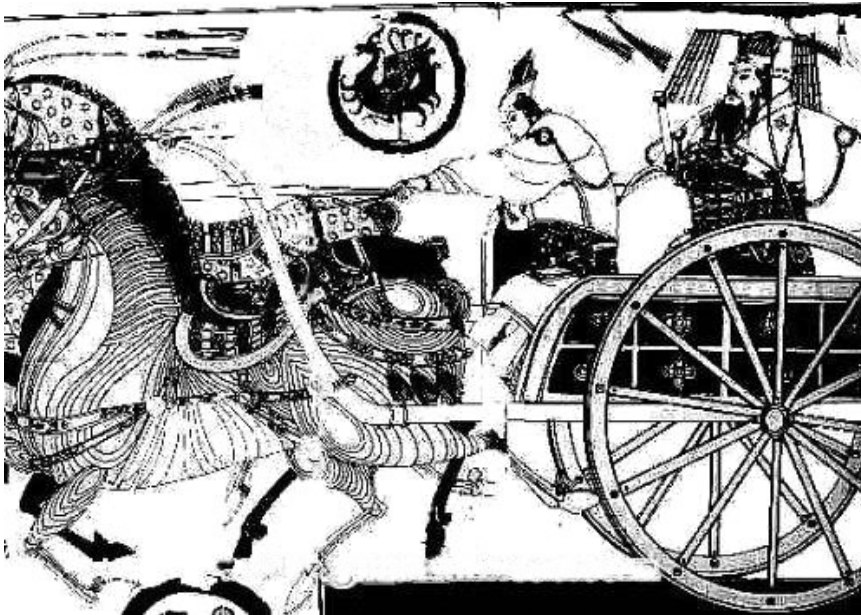


『六条问事』与有效监督

——汉武帝如何监督『一把手』

□张凯宁 崔庆



州、交趾、朔方。每州派遣刺史一人，十三部刺史由中央统直接管辖，由御史中丞具体领导。同时，汉武帝亲自规定刺史职责，以极其简要的规条界定了刺史的日常监察内容，这就是著名的“六条问事”。

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抓主要矛盾，“六条问事”列出的负面清单针对性强，其核心要义就是聚焦监督地方“一把手”，严管地方“一把手”。根据“六条问事”，刺史主要监管“两千石”的地方长官，其实就是一郡的最高长官郡守以及各国诸侯王，对于其他地方官员一概不问。监管对象不多，但是并不意味着任务轻松，因为这六条是对“一把手”是否有这些问题的全方位立体监督。

这六条是：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案，风厉杀人，怒则刑，喜则淫赏，烦扰刻薄，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

“六条问事”高度聚焦“一把手”的日常工作生活，条条说在节骨眼上。第一条，看似和“一把手”无关，其实直指地方和中央关系。打击豪强不法，就是为了从根子上铲除山头主义，防止“一把手”和地方利益集团相互勾结。如果地方上豪强横行乡里，“一把手”要负全责。第二条，是监督“一把手”是否严格执行中央政令，是否违法乱纪、以权谋私。第三条，监督的是“一把手”是否为官不为、为官乱为，是否能够保持地方平稳和谐。第四条，是监督“一把手”选人用人是否公道正派，严禁任人唯亲，严禁搞小圈子。第五条，是针对“一把手”的身边人，要求“一把手”严管家人，一家不治，何以治一方。第六条，是严防“一把手”搞贪污受贿和利益输送，破坏地方经济发展。

察吏是治国之本，监督“一把手”是重中之重。如何有效监督地方“一把手”，历来都是希望有所作为的中央政府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只有将有限的力量聚焦在明确目标上，才能发挥出事半功倍的效果。“六条问事”集中精力监督、管理那些位高权重的封疆大吏，不纠缠于细枝末节，达到了纲举目张的效果。

刺史不只是坐在办公室里等举报、等报告。每年秋分时节，刺史必须带领工作小组在其监察大区内，对各国各郡开展巡查，考察地方长官和诸侯王的工作业绩和社会评价。这是点面结合，考察官声政声和社风民风，从工作链条的末端了解地方官治理理政的严谨程度和工作水平。刺史的产生，可由御史推荐，皇帝任命，和地方没有太多利益瓜葛，地位较为超脱。“六条问事”和刺史制度，无疑大大加强了中央政府权威，保证了中央政令畅通，开启了大汉发展的新阶段。

大汉开国之初，百废待兴，推崇无为而治，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刚不可久，柔不可守”，中央政府控制力消减之后，内忧外患逐渐暴露出来。七国之乱后，大汉为了保持政局稳定，重视地方长官的长期任职，有的郡守在一地工作十数年，宗族、故吏、门生等各种关系交织在一起，渐渐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利益团体，选择性执行中央政府大政方针，甚至发生“政令不出长安”的情况。问题到了汉武一朝，变得更加棘手了。汉武帝外击匈奴，内颁推恩令，显示出振兴家国的强烈愿望，大汉发展必须升级转型。

大国发展，尤其是从大国到强国的蜕变期，离不开科学的治理体系和高效的官员队伍，中国古代的历朝先贤，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不少尝试和探索，盛世的背后必定是铁的纪律、严密的监察体系和明确的中央权威。汉武一朝对于监督体系进行深度整合，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初置丞相司直；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初置司隶校尉。这些措施和刺史制度、御史制度一起形成了内外结合、覆盖较全的监督体系。更重要的是，这些监督措施有相互制约的关系，推动有形监督转化为有效监督。这种监督压力也通过“一把手”层层传导到整个官员队伍。

找准了支点，才能撬动制度变革，促进体系提升。“六条问事”言简意赅，聚焦主要矛盾，解决主要问题，使监督变得有形有力有效，为汉朝的集中发展提供了保障，也对后世的监察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读书与革命

——容闳和孙中山的交往

□袁达松 冯诗楠

容闳与孙中山同为近代史上西学东渐、西制东移的重要人物，而他们之间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密切交往历史。

两个香山人的读书与革命

香山是容闳与孙中山共同的故乡。1828年11月，容闳出生在广东香山县南屏村。孙中山则是1866年11月诞生于广东香山县翠亨村。虽然容闳比孙中山年长38岁，相当于是孙中山的父辈，但这两位香山人拥有相似的读书经历与革命奋斗，并且在革命道路上交汇和共鸣。

容闳与孙中山都出身于香山县的普通农民家庭，在青少年时均有海外留学经历。19世纪初，传教士所办的教会学校，因可以免除学费，一些贫穷的农家子弟得以有机会入学就读。1841年，容闳进入澳门马礼逊学校读书，他在这里开始接触西方科学文化知识。1847年，19岁的容闳跟随老师罗宾·勃朗前往美国读书。到了美国之后，他先在马萨诸塞州的蒙森城读预备学校。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回忆道，蒙森学校的老师“注重培养学生的品格，而不是把他们变成活百科全书或聪明的鹦鹉”。由此可见，在预备学校的学习过程中，容闳广泛涉猎西方文学作品，注重形成自己开阔的视野与高尚的品格。

1878年，12岁的孙中山跟随母亲前往夏威夷檀香山探望在那里经商的哥哥孙眉。1879年，进入夏威夷奥兰尼书院就读。孙中山初到夏威夷时不懂英文，但他刻苦攻读，很快掌握了学习英语的规律，读写能力获得惊人的提升。那时的孙中山掌握了英语这门国际语言，为他此后博览外国书籍及接触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人士打下了基础。从意奥兰尼书院毕业后，孙中山进入教会学校欧胡学院。该校是檀香山的最高学府，宗教教育占据了重要地位。因哥哥孙眉担心孙中山信教，孙中山被迫于1883年回国。海外4年多的学习生活经历，拓宽、提升了孙中山的视野与格局，使其成为一名初步具有民主政治观念和科学文化知识的青年。

对比容闳、孙中山二人的大学时期，他们都大量阅读各种书籍。1850年，容闳从预备学校毕业，被耶鲁大学录取。容闳在耶鲁大学所受的是博雅教育，系统研读了高等数学和西方近代文明的经典著作。孙中山于1883年返回中国后，继续读高中，高中毕业后，孙中山在1886年先后进入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医校和香港西医书院读医学本科。在医学院读书期间，孙中山并没有只专注于医学课程，还阅读了大量有关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书籍。据与孙中山同窗5年的关景良回忆，孙中山最爱读的书是《法国革命史》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容闳、孙中山在大学时代系统接受了西方高等教育，而后来二人的事业发展历程也

印证了青年时代学习的民主科学思想对他们的影响深远。

虽然容闳、孙中山都深受民主思想影响，但容闳直到晚年才转向支持革命，孙中山青年时即以革命为业。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回到中国之后，一直在寻找能够支持他主张的中国政治力量，幻想成为智囊式的“师爷”。从访问太平天国向洪仁开提出七项建议，到向曾国藩提出“幼童留美教育计划”，再到向张之洞提出办实业、成立国家银行的主张，到最后向孙中山提出革命及国家建设的诸多建议，反映了容闳作为耶鲁大学毕业生，将自己定位为“学者型”人物，从西方现代社文明经验的角度出发向中国不同的政治力量坚持不懈地献言献策。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读大学时，即在同学之中积极组织领导政治小团体“四大寇”，“物色有志学生，结为团体，以任国事”。与孙中山交往密切的同学有陈少白、尤列、杨鹤龄、陆皓东、郑士良等，而这些人士日后也成了香港兴中会的成员。可见，孙中山自大学时代起，就在筹划组建以自己为核心的政治团体，并在该政治团体中任领袖角色，希望在未来的中国变革中施展力量。

容闳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影响与支援

容闳对清朝政府失望后，开始转向同情革命。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容闳参与维新派领袖唐才常组织的旨在保卫光绪皇帝的自立军活动，被推选为“中国国会”会长。后因自立军起义计划遭到泄露，唐才常被捕牺牲，容闳被迫从上海逃往日本避难。1900年9月，容闳在去往日本的轮船上与孙中山相遇。这是容闳和孙中山的第一次会面。当时，容闳72岁，孙中山仅34岁，容闳比孙中山年长38岁，但并未妨碍他们成为革命道路上的志同道合者。容闳是“西学东渐”的先驱者，而孙中山是“西制东移”的领袖，加之他们同为广东香山同乡，使得二人一见如故，在轮船上促膝长谈、纵论中外古今。容闳对孙中山初次会面的印象是“其人宽广诚明，有大志”，并以“华盛顿、富兰克林之心志”勉励孙中山。而孙中山也在事后推崇容闳“声望素著，富新思想”，是致力于中国革新的老前辈。容闳与孙中山的此次会面，是容闳倾向于革命的开始，是他一生思想的转折点。从此，容闳放弃了改良中国的想法，转而积极支持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

1908年12月，容闳写信给自己的美国朋友、军事学家荷马李，建议他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1909年12月，孙中山抵达美国与容闳见面。容闳提出了一个名为“红龙中国”的起义计划：募集五百万美元、一亿发子弹和十万支枪，支持孙中山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清朝政府。1910年2月，容闳又写信给孙中山讨论“红龙中

国”计划的具体安排，并安排美国军事学家荷马李、财经界人士布思与孙中山会谈，筹划军事费用。在荷马李、布思的建议下，孙中山对起义做了更为周全的谋划。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专制王朝被推翻，以民主共和制为政体的中华民国成立。辛亥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美国，已是83岁高龄的容闳极为激动，他向国内的革命者写信表示祝贺。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随即致函容闳邀请他回国参加建设。但那时容闳已中风卧床，无法行动。在弥留之际，容闳叮嘱两个儿子务必回到中国，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学识，“吾费如许金钱，养成汝辈人材，原冀回报祖国”。容闳的儿子容颉槐谨遵父亲的教诲，在美国学成后回到中国担任广东革命政府军火制造局总理兼工程师，获授陆军少将军衔。容颉槐在职期间，军火制造局生产增长一倍以上，各类武器的质量也有较大的提高。

香山思想家与革命者现象

有一个文化现象值得关注，容闳与孙中山同是广东香山县人。自明清尤其是近代以来，香山因特殊的地理位置与人文历史环境，孕育了众多追求民主的爱国人士。香山县在近代涌现出很多影响深远的历史人物，究其原因，可主要归纳为三点：

其一，1553年葡萄牙人取得澳门的居住权，经过400余年欧洲文明的洗礼，澳门成为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中心，是中国近代观察西方文明的首要窗口，促成了香山文化开放包容的特点。此外，香山县毗邻香港，鸦片战争后，英国对香港的文化输出，也增加了香山与西方文明的接触。其二，香山人读书不限于参加科举，有机会接受西式教育。其三，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广泛交友，尤其注重与香山同乡之间的联络与支持。郑观应、容闳、陆皓东、钟荣光、郑藻如等香山同乡与孙中山来往密切，启发和支持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

以孙中山、容闳为代表的香山人视野宽广，更易接受外来新事物，善于吸收西方文明的进步因素，这些香山人逐渐从边陲小县走向中国民主革命的舞台。他们的读书、革命与交往经历至今饶有意义，对时下的广大学子、学人如何正确理解读书治学与国家建设的关系，仍具有深刻镜鉴之效。



（上接1版头条）

树立和维护宪法权威 必须加强宪法宣传教育

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宪法的伟力在于人民出自真诚的信仰。只有保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尊重和保障人权，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宪法才能深入人心，走入人民群众，宪法实施才能真正成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在全社会加强宪法宣传教育，提高全体人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努力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让宪法家喻户晓，在全社会形成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我们要通过不懈努力，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让广大人民群众充分相信法律、自觉运用法律，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宪法不仅是全体公民必须遵循的行为规

范，而且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武器。我们要把宪法教育作为党员干部教育的重要内容，使各级领导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掌握宪法的基本知识，树立忠于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的自觉意识。

开展宪法宣传教育，是全面贯彻实施宪法的重要基础性工作，为此宪法宣传教育需要从宪法文本入手，学习和理解原文，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方面工作要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宪法法律至上”是指在我国法律制度、法律体系框架和司法制度下，在规范社会行为的诸种社会规范中，在调整社会关系的诸种社会规则中，宪法法律具有最高的法律权威、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是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公民个人的根本行为准则，是这些社会主体对有关事实和行为进行法律认知、作出法律评价和法律判断的最高依据。坚持

宪法法律至上，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必然要求，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坚持执政为民和党的事业至上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制度保障；是恪守人民主权原则、尊重人民意志、维护人民权利、保障人民民主、实现人民利益至上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制度保障。

当前，加强宪法宣传教育，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学习贯彻宪法精神紧密结合起来，把学习宣传宪法与实施宪法紧密结合起来，依法保障全体公民享有广泛权利，努力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保障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让人民群众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都能够感受到宪法权威、宪法尊严、宪法温暖和宪法魅力，通过宪法宣传教育和教育有效实施等多种路径和形式，例如深入开展公民宪法教育、推行宪法宣誓制度、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依法查处违宪行为、落实宪法基本权利等，努力拉近宪

法与人民群众的距离，把高高在上纸面的抽象的宪法条文，变成人民群众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具体方式，把宪法变成可用之法、刚性之法、行动之法，在宪法“脱虚向实”的具体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强化全体公民对于宪法的政治认同、法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和事实认同。

我国宪法是符合国情、符合实际、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好宪法，是充分体现人民共同意志、充分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充分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好宪法，是推动国家发展进步、保证人民创造幸福生活、保障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好宪法，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考验、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根本法治保证。当前，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创新发展我国宪法学理论，完善宪法制度，维护宪法权威，充分发挥宪法在开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程中的重要促进和保障作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

（上接1版二条）这一概念提出以来，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支持，已经写入联合国相关决议，为人类社会治理的民主化多样化增添了新的希望。中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行动中，一是在国际事务中坚持作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积极呼吁和投身改变已经不能满足新的世界发展需要的旧的国际治理体系，更好地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二是积极主动地加强自身能力建设，抓住有利机遇和时间窗口加快发展自己，推进产业升级，提升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上的分工地位，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三是加强大国之间的合作交流，努力维护自身发展权利，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实现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四是坚持和优化战略方向，增强战略定力。中国正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按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战略安排，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作者系中央党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

发掘和扩大共同利益；在应对共同危机和挑战，努力减少“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中明确共同责任；在日益密切的国际交往中秉持和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共同价值。

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和理念的提出，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协和万邦”“周而不比”“和而不同”“达则兼济天下”等合理内核，发展了共产党人“四海皆兄弟”的国际主义情怀，指明了人类为未来奋斗的目标和方向，既立足实际又指向未来，既高扬理想又不断奋斗，是对一切霸权主义、冷战思维和唯利、唯力意识的有力反击，预示着新一轮人类主体意识和整体意识的觉醒。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地参与国际治理大家庭中，愿意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勇敢地承担起和完成好这一光荣的历史使命。

（作者系中央党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